

乾隆朝贪风之盛,从根本上说是封建官僚政治日趋腐败的产物,而盛世之下,官绅士子追求豪华生活的社会风气,也为官员贪蠹提供了特殊的环境。除此之外,乾隆皇帝个人的政治素养、统治作风,以及性格与爱好,也都对时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
乾隆朝贪官为何这么多

刘凤云

有清一代,乾隆朝官吏贪墨之风尤盛,其时,不仅案件多发,婪赃巨大;而且上至部院督抚,下至胥吏衙役,几乎无官不贪,尽管乾隆帝屡兴大狱,然诛殛愈众,而贪风愈盛。

执政过程中执法不一

乾隆皇帝虽明确规定:凡官员犯有侵贪、亏空、苛索、贿赂、欺冒、挪移、盗库等贪污行径,一经发觉,严惩不贷,强调“不可为贪官开幸生之路”,并以“斧锁一日未加,则侵贪一日未止”,实施严刑峻法。然而,专制政治赋予了统治者在执政过程中很大的随意性,故而乾隆帝个人的权力和意志常常凌驾于法律之上,其主要表现为:

其一,因人立法,徇底亲信。诸如云贵总督李侍尧,在乾隆四十五年(1780),因贪赃索贿,为云南储粮道海宁参劾,由于情节恶劣,大学士九卿会议斩决,但乾隆帝认为李侍尧在督抚中最为出色,遂百计回护,命各直省督抚重视。但当各督抚多请照初议定罪时,乾隆皇帝犹欲开脱之,对支持

九卿之议的富勒浑等人大加斥责,并不顾众意,以“罪疑惟轻,朕不为已甚之事”,下诏将李侍尧定为斩监候。不久,即降特旨,赐其三品顶带花翎,起用为陕甘总督。此后,李侍尧贪渎如故,而“上终怜其才,为之曲赦”。又如,闽浙总督陈辉祖亦以“能事”为乾隆帝所器重。乾隆四十六年(1781),陈辉祖因其弟为王亶望贪污大案成员,当坐瞻徇情弊罪,交刑部治罪。但乾隆帝却极力开释之,他说:“朕断不肯因其弟株连,遽置重典。陈辉祖尚属能事,著加恩免其治罪,降为三品顶带,各留本任。”(《清史列传》卷18,陈辉祖传)而且,还委其以查抄王亶望赃物的重任,陈辉祖借机侵贪,又酿成一起侵盗官物的大案。尽管如此,乾隆帝意犹宽容,降旨改斩立决为新监候,只因新任闽浙总督富勒浑、浙江巡抚福崧等连章劾奏,以闽浙两省仓谷亏空等情实,证实了陈辉祖为政之贪。乾隆帝这才迫于形势,赐令自尽。

其二,以时立法,时宽时严。乾隆帝在其统治前期,执法尚为

严厉,二十余年中,共处置贪污大案七起,即兵部尚书步军统领鄂善案;浙江巡抚常安案;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案;山东巡抚鄂乐舜案;湖南布政使杨灏案;云贵总督恒文案,以及山东巡抚蒋洲案。这几起案件,犯赃者家被籍没,人被处死。其中,蒋洲乃前大学士蒋廷锡之子,亦严惩不贷。为此,乾隆皇帝还特加指示:“外吏营私贪黷,自皇考整饬以来,久已肃清,乃不意年来如杨灏、恒文等案,屡经发觉,而莫甚于蒋洲此案,若不大加惩创,国法安在?”表明了这一时期乾隆帝在执法上的严肃性。但是,在更多的情况下,特别是到其统治后期,乾隆帝惩贪则“多从宽纵”。乾隆四十三年(1778),粤海关德魁亏空税银,按律应赔两万余两,乾隆帝谕令全免。浙江巡抚福崧,早在乾隆五十二年(1787)盘查浙江

省亏空案及平阳知县黄梅贪污案时,已发现其婪赃之蛛丝马迹,但乾隆帝未予追查,只将福崧改调他省。此外,像于敏中、杨景素等人,皆赃私累累,乾隆帝直到他们死后才予以处置。其宽纵的结果,必然为官吏营私舞弊大开方便之门,“督抚等遂尔无所敬畏,任意妄行”,酿成乾隆后期一次又一次的贪污大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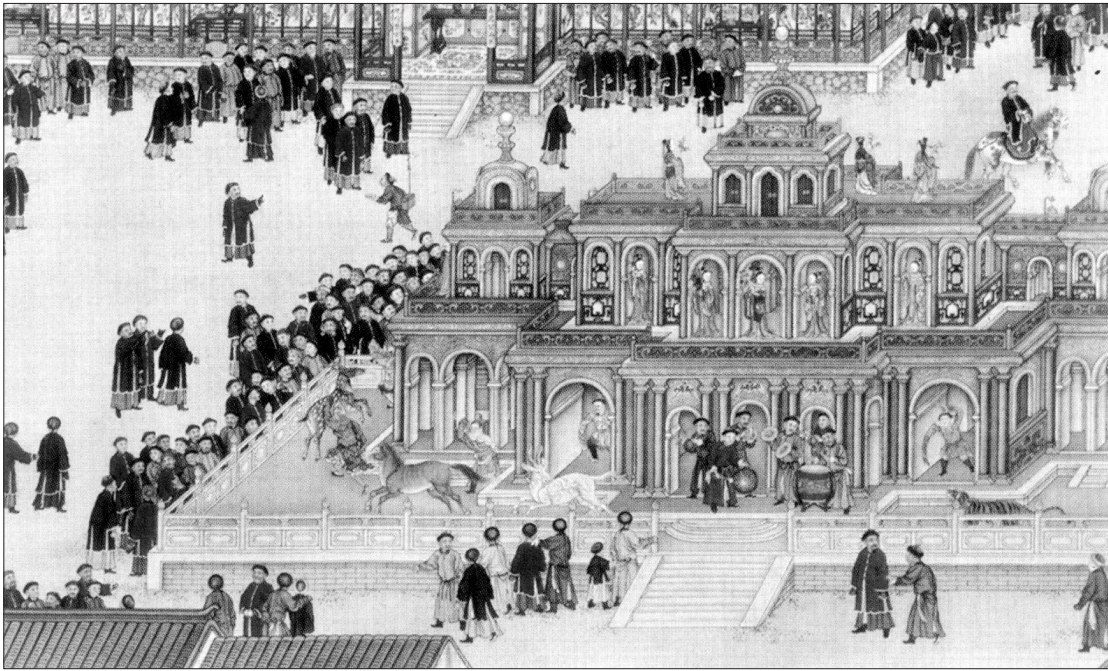
宠重和珅形成恶性循环

乾隆帝在其统治后期宠重和珅,当为人尽皆知 的故事。他先后任命和珅为军机大臣、总管内务府大臣、领侍卫内大臣、步军统领和吏、户、兵三部尚书等官职,秉政达二十余年之久。乾隆后期的政治受到和珅的诸多影响。

据记载:“时和公相,声威赫奕,欲令天下督抚皆奔走其门下以快。”“一时,贵位无不仰其鼻

息,视之如泰山之安”,或“恃为奥援”极力攀附之。故而,随着和珅官职与官位的不断加升,其家也开始门庭若市。有人形象地描述道:“和相当国,一时朝士若鹭,和每日入署,士大夫之善奔走者皆立同道左,唯恐后期,时称为‘补子胡同’。”补子是官服,说的是官员奔竞结交和珅的丑态,而时风可见一斑。至于官员走和珅门径的具体情形,嘉庆时查办的两淮盐政徵瑞行贿案可以说明一定的问题。两淮盐政是一肥缺,为了保住此缺,徵瑞供称:他于嘉庆元年(1796),和珅妻故逝时,馈银二十万两,“彼时和珅意见少见,欲伊增至四十万,是以未收。而从前曾送过和珅二十万,当经收受。此外和珅交办缎匹物件等项,并奇巧之物,不可胜计”。

和珅婪赃纳贿,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:其一,官员在政治目的



由《乾隆帝八旬万寿图卷·西洋点景建筑》可见太平君主生活的纵恣奢华。

■文摘

几千年来,中国传统婚姻一直实行的是“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、迎亲”的六礼之仪。19世纪末,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和西方婚仪的东渐,一些追求时尚的国人开始参酌中西礼法,既吸取西式婚仪的隆重、热烈、简便的优点,又抛弃其在教堂举行等宗教习俗,创造了一套中国式的“文明结婚”仪式。这种新式婚仪,改变了旧式婚礼的许多陋习,带来了不少方便,从而逐步为民众接受、欢迎,绵延至今。

新式婚礼受到欢迎

新式结婚在清末已出现。徐珂的《清稗类钞》记载了当时“文明结婚”的情况:“迎亲之礼,晚近不用者多。光、宣之交,盛行文明结婚,倡于都会商埠,内地亦渐行之。礼堂所备证书,由证婚人宣读,介绍人、证婚人、男女宾代表皆有颂词,亦有由主婚人宣读训词,来宾唱文明结婚歌者。”这种新式的文明结婚,不仅大大简化了结婚礼仪,而且尊重了男女双方的意愿。

新式婚礼简单隆重的特点逐渐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,其相关报道也日益增多。1907年10月13日,天津塘沽张小田与北京慕贞女子书院的贾玉莲,在教堂由牧师主持举行文明结婚。报载“中西祝贺者甚众。鲍太太按琴,男女学生唱诗,一时颇形热闹。礼毕,新夫妇乘双马车往北门外慕贞家胡同张君宅,并有成美旅馆袁牧师夫妇及路矿等局诸友,均乘马车送新夫妇回家”。

到了民国初年,这种新的婚姻仪式更为流行。文明结婚者,男女双方不会去会馆合婚,也不必耍什么龙凤帖,而是到婚丧用品服务部社买两张印好的结婚证书,填上新郎、新妇的姓名、年龄、籍贯,在举行婚礼时,由证婚人、介绍人和男、女双方主婚人用印,就算礼成。

当时,社会上有专门租赁文明结婚用品的商店。经营范围包括文明结婚用的花马车、花汽车、乐队,以及礼堂里的陈设,新郎新娘穿的礼服、花篮、手花、胸花,甚

百年来的婚礼变革

邵先崇

婚礼的程序。它是当时新旧婚俗调和的产物,既是一种改良,也是一种变通。

蒋宋婚礼令白色婚纱风靡

新娘身穿白色婚纱,新郎身着西式大礼服,是新式婚礼的基本要求。民国初期,大礼服和白色婚纱虽已传入中国,但采用的并不普遍。1927年12月,蒋介石、宋美龄在上海举行的婚礼,真正使白色婚纱风靡全国。

1927年12月1日,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昆山路景林堂宋宅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仪式。下午,婚礼舞会在外滩大华饭店举行,并在蔡元培主持下再次举行新式婚礼。青帮首领杜月笙负责维持秩序,1300多位各界名流以及美、英、日、挪威、法等16国领事出席婚礼。

新式婚礼现场,台上置有孙中山画像,边缀国民党党旗和中华民国国旗,中间悬挂“福”“寿”两字。婚礼由中俄管弦乐队奏乐。蒋介石与宋美龄入场时,将着西式礼服,宋穿白色长裙婚纱。新人向孙中山像及来宾行三鞠躬礼。这次婚礼,在当时可谓花费浩繁,费用达数百万元。

当天,蒋介石发表文章《我们的今日》,称他们的婚姻是“神圣的结合”。随《我们的今日》一同见报的,是蒋介石与宋美龄两人的一张新婚照。照片上的宋美龄身着白色婚纱,风姿绰约,光彩照人,令无数青年女子仰慕不已。此后,白色婚纱在上海滩广泛流行起来。

集体结婚让人耳目一新

民国时期,新式婚礼得到进一步的发展,而且开始为南京国民政府所提倡。但是,对一般民众来说,新式婚礼仍有费时费钱力之缺憾。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,一些进步人士致力于婚

与利益的驱使下,或自上索贿,导致下官搜刮民脂民膏;或监守自盗,亏空国帑。其二,上行下效,和珅恣意贪婪,官吏争相效尤,有恃无恐。故乾隆后期的贪污大案,凡情节严重、手段卑劣者,多与和珅有关。

和珅为了满足乾隆帝的挥霍欲望,还挖空心思,在乾隆四十五年(1780)推出“议罪银”制度,规定凡官员坐罪,可以通过缴纳银两的方式得到豁免或减轻处罚,议罪银所得款项均入内务府各库,它增加了皇室 的收入。然而,官员的贪污行径更加肆无忌惮,有人在缴纳议罪银后旋即再去婪赃索贿,形成恶性循环。

太平君主的纵情奢华

就乾隆皇帝的个性而言,他除了“日励自心强不息”之外,还好大喜功,醉心于盛世太平君主的享乐中,纵恣奢华。其突出表现有两点:

一是大量收受贡纳。凡逢年节、寿诞、庆典,地方官员都要向皇帝献纳,称为“土宜物件”。虽然乾隆帝多次发布上谕,要臣下勿进或少进贡品,但却从不停止收受,甚至还有以摊派的形式强征的事情发生。如乾隆五十五年(1790),乾隆帝八十大寿,“内外宫殿,大小物仪,无不新办。自燕京至圆明园,楼台饰以金珠翡翠,假山亦设寺院人物,动其机括,则门窗开阖,人物活动。营办之资无虑亿万,而一毫不费官帑,外而列省三品以上大员俱有进献,内而各部院堂官悉捐米俸,又以两淮盐院所纳四百万金助之。”这次庆典所用经费共计白银一百一十四万四千二百九十七两七钱。其中地方官报效数额占62%,均“按其通省养廉数目,量其多寡,酌量令其扣缴十

分之二五”。二是巡幸无度。乾隆在位期间,六次南巡,七次东巡,五次西巡,至于近畿京郊,车驾时出,数不胜记。凡巡幸所经,虽有赈济灾民、治理水患等惠政,但供需之侈,费耗之巨,亦是人所共知的。如每次南巡,随行人员多达2500多人,在车驾往返5800余里的行程中,陆路用马五六千匹,大车百余辆,水路用船千余艘。而巡幸的准备工作,早自前一年便开始进行,并由亲王任总理行营事务大臣,负责勘察道路,修桥铺路,修葺名胜和兴建行宫等等。排场上极尽扬厉,饮食上也相当讲究。

乾隆帝的纵情骄奢,必然影响到时政和时风。首先,大小臣工为迎驾纷纷效尤。仅以各地给皇帝搭盖的彩棚为例,最初是因乾隆帝回京经由山东、直隶时,天气已渐炎热,需搭棚避暑。后为取悦帝意,各地争相攀比,便一律搭棚接驾,以至竟成千里御道彩棚相望之一大景观。又如苏州的狮子林,本已荒废多年,地方官自第一次南巡后开始修复,历经十年,至三次南巡时,终成一座风景秀丽的江南名园。其次,巡幸直接加速了吏治的腐败。地方官无论贡纳还是巡幸办差,都要耗费巨额银两。这给地方官办差造成巨大压力,并成为其贪污的口实。

乾隆朝贪风之盛,其原因是多方面的。从根本上说,它是封建官僚政治日趋腐败的产物,而盛世之下,官绅士子追求豪华生活的社会风气,也为官员贪蠹提供了特殊的环境。除此之外,乾隆皇帝个人的政治素养、统治作风,以及性格与爱好,也都对时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
礼成,由证婚人向新人赠送结婚证书和纪念章。结婚证书事前已盖上证婚人、主婚人、结婚人的私章,置于锦绣小圆筒内;纪念章以银质材料精工制成,盛于红丝绒盒中,并刻有“上海市新生活集团结婚纪念品”字样。吴铁城亲手颁发结婚证书,吴醒亚专发纪念章。礼毕,57对新人在音乐声中步出礼堂,向广场摄影留念。在整个集团结婚行礼过程中,上海电影界、美国派拉蒙、米高梅等影片公司及各报记者抢拍了新闻片与镜头。

与面向家庭的结婚相比,集团结婚表现出较强的社会色彩。婚礼上,政府部门的代表承担了家长的部分职责,当然双方家长和介绍人也都出席,以示家庭对婚礼的支持。

上海首届集团结婚的这种隆重、热烈、简朴、文明的做法,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,一时要求参加者甚众。上海市府遂确定每年举行4次集团结婚,是年全市即举行了5届,参加者达300余对。

(选自《近代中国的新式婚丧》)



1935年4月3日,57对新人在上海市政府大礼堂举行了全国首届集体婚礼。

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普查

郁文

世界各国都把掌握准确的人口数量、人口素质、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等情况,作为科学治国和宏观决策的基础。通过人口普查,可以全面了解国家人口和住户的性别、年龄、民族、国籍、受教育程度、行业、职业、迁移流动、社会保障、婚姻生育、死亡、住房等基本情况。这些信息将在各级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。

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统计的国家之一,也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有长期不间断的人口调查记录的国家。据文献记载,公元前2200年左右,大禹“平水土,分九州,数万民”。这里的“数万民”就是统计人口。进入封建社会以后,人口数字的统计方法更加完整。汉朝有“算赋法”,隋朝有“输籍法”,唐朝有“户籍法”,宋朝有“三保法”,元朝有《户口条画》,明朝有“户帖制度”。但历代政府调查人口都是为了征税、抽丁,并不重视保存统计资料,因此留存至今的完整的人口统计资料很少。

古代中国亦曾是人口大国,但由于政权更替、战乱等诸多原因,往往使人口急剧减少。根据有关专家的考证与测算,中国最早的夏朝人口约在1300万左右。到战国时期,人口总数最高时约在3000万以上。但战国时期兼并战争连绵不断,孟子概括这一时期的战争是“争城以战,杀人盈城。争地以战,杀人盈野”。秦灭六国后,全国人口总数估约在2000余万。又经过秦十多年暴政统治和秦末战争,至汉初人口减至1300万,甚至更少。

西汉时期国情较为稳定,社会经济 发展较快,中期全国人口约在5900多万。西汉末年,灾害频繁,加上连年战乱,人口剧减,到东汉初期人口约降至2100万。据《后汉书》记载,东汉的人口极盛时期大约有5400万到5700万。东汉末期发生黄巾兵乱,随后群雄据据混战,曾经繁华的黄河流域变成“千里无鸡鸣”的无人区。战争期间,天灾肆虐,防疫流行,中原大地生灵涂炭,沦为人间地狱。东汉末年,至少有2500万人在社会动乱和灾害、瘟疫中丧身。

公元265年,西晋统一全国后采取了一系列较为积极 的经济措施,人口恢复到4000万左右。但西晋后期,外戚专权,宗室强盛,争夺兵权,致使“八王之乱”历时16年。后杂居北方的五个较大的少数民族乘机入侵,使西北地区陷入长期战乱,史称“五胡乱华”。战乱